

“十二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
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

总主编：王巨才

延安音乐主编：赵季平 冯希哲



【第十三册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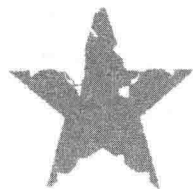
# 延安文艺档案·延安音乐

## 延安音乐家（三）

冯希哲 敬晓庆 张雪艳 / 编著

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【第十三册】

总主编 王巨才

延安音乐主编 赵季平 冯希哲

## 延安文艺档案·延安音乐

# 延安音乐家（三）

冯希哲 敬晓庆 张雪艳 / 编著

## 陈 紫



传略  
ZHUANLUE

陈紫（1919—1999），广东惠阳人。当代著名作曲家。

1919年3月20日出生，原名陈先艺（一作“逸”），字子述，曾用名陈子树，笔名循民、吴化常、彭彤等。少年时代在北京、上海度过。中学时代在北京参加了“一二·九”“一二·一六”学生运动。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了党领导下的“民族解放先锋队”。193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；1938年赴冀中游击区，同年考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；次年转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，成为三期学员，从师冼星海、吕骥等学习作曲。1940年毕业后任鲁艺音工团团员，后为音乐研究室研究生至抗日战争胜利。此期间创作有歌曲《抗大大合唱》，歌剧音乐《白毛女》（参加作曲），秧歌剧音乐《变工队》《拖辫子》等。1945年年底赴张家口，在华北联大文工团工作。后任东北鲁艺音乐系教员。1947年任鲁艺文工三团团委、四团演出科长，



陈 紫

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8年改任东北鲁艺歌剧团团委兼音乐系作曲教员。在东北创作有歌剧音乐《永安屯翻身》《复仇》《两个胡子》《归队》，大合唱《铁树开花》及歌曲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进行曲》等。

1949年，陈紫调任中央戏剧学院歌剧团团委、音乐顾问，后兼任歌剧队队长，至1966年历任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作曲、中央实验歌剧院创作组组长、中央文化部创作组组员等职。此期间主要作品有大型歌剧音乐《刘胡兰》（参加编剧）、《迎春花开了》（与梁克祥合作）、《窦娥冤》（与杜宇合作）、《春雷》（与杜宇合作）、《春风杨柳》《山花烂漫》《矿工的女儿》《韦拔群》等，小歌剧音乐《全家光荣》《金凤树开花》等20余部，大合唱《铁树开花》，舞剧音乐《和平鸽》等，电影音乐《上海姑娘》《国庆十点钟》（作插曲）、《心连心》等。《窦娥冤》在1979年文化部举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礼演出中荣获歌剧创作一等奖。《刘胡兰》选段《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》等影响广泛。1981年率中国歌剧舞剧院表演艺术家小组赴法国参加法国艺术节。后任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，为中国音协理事、创作委员会常委，歌剧研究会主席团成员。创作上以戏剧音乐为主，歌剧音乐富有歌唱性及戏剧表现力，对发展中国特色的民族歌剧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陈紫因久病医治无效，于1999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0岁。



## 《刘胡兰》

当代歌剧。创作于1954年，由于村、海啸、卢肃、陈紫编剧，陈紫、茅沅、葛光锐作曲。根据共产党员刘胡兰的真实事迹改编。该剧讲述了1947年在山西省云周西村，刘胡兰与群众送别子弟兵，十二团的连长王本固（刘胡兰的未婚夫）率领队伍开赴前线，不久王连长受伤回到村里。地主石庭槐随即领“倒算队”也回到村中。刘胡兰为掩护伤员与敌人周旋，因同伴秀英的软弱而被捕。敌人对其

威逼利诱均告失败。最后，刘胡兰为救乡亲而英勇就义，牺牲于敌人的铡刀下。从此，一曲“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”的颂歌，永远回荡于神州大地。



歌剧《刘胡兰》剧照

歌剧《刘胡兰》以山西民歌为基调，吸收了山西孝义皮影戏和山西梆子等的元素，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，成功地表现了刘胡兰多方面的思想感情，塑造了英雄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音乐形象。其中第一幕刘胡兰送别子弟兵时唱的《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》，旋律舒展优美、亲切热情，节奏富于变化，声声沁人肺腑，抒发了少女刘胡兰细腻的内心世界，表达了刘胡兰对亲人八路军的眷恋、热爱和自己留守抗敌的决心。经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后迅速传遍大江南北，成为民族歌剧的经典选曲。

### 《窦娥冤》

当代歌剧。根据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著名悲剧《感天动地窦娥冤》改编，陈紫、杜宇作曲。1960年5月由中央实验歌剧院首演于北京天桥剧场。

内容基本依照原著而来。元代统治严酷，再加上连年灾荒，民不聊生。窦天章为求功名，将女儿端云（即后来的窦娥）留给蔡婆当儿媳以换取盘缠。13年后，蔡婆被赛卢医逼债险些丧命，是张老与其子张驴儿救了蔡婆的命。当他们得知蔡

婆家尚有一守寡的儿媳时，顿起歹心，欲强逼她婆媳与其父子成婚，遭到窦娥坚拒。张驴儿欲下毒害死蔡婆，未承想反把其父害死。张驴儿嫁祸窦娥，告到公堂，太守桃杌对窦娥屈打成招。法场上，窦娥临死三誓三愿。问斩后果然血溅白练、六月大雪、楚州大旱三年。此事惊动了已当上钦差大臣的窦天章，他连夜查阅与窦娥有关的案卷。当夜又梦见窦娥托梦诉冤。醒来命立传此案一千人犯重审，冤案遂得昭雪。



歌剧《窦娥冤》剧照

剧中成功塑造了一个被恶势力迫害而至死不屈的妇女形象——窦娥。她短短的一生中，遭到丧母丧夫的打击、泼皮流氓的迫害、贪官污吏的毒刑和判决，这种种不幸和灾难，吞噬了她的青春和生命。窦娥是善良的，同时又有强烈的反抗精神。她的善良，用在对待自己的亲人、受压迫者；她的反抗，用在对付作恶的坏人、压迫者。她不屈服于任何恶势力，在临斩前敢于痛骂代表至高无上权力的天地鬼神：“地啊，你不分好歹何为地？天啊，你错勘贤愚枉做天！天地也是这样怕硬欺软、顺水推船……”痛快淋漓的质问，直问得“天地”也哑口无言。

歌剧《窦娥冤》保持了关汉卿原作的立意与构思，尽可能地保留其精华，文学上不失其原貌，而结构上又使之通俗并适合重新作曲和交响化的需要。这是一



次改编古典名著为新歌剧的成功尝试。该剧于1979年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时获创作、演出一等奖。



## 踏上革命文艺的征程<sup>①</sup>

### 奔向延安

青年团搞起来以后，我准备参加一二〇师。就在这时，延安抗大派人来招收抗大学员，我就要求参加抗大，同时被批准的有我、冯牧，还有其他几个青年学生，他们也是北京学生。

那时“左”的路线仍然很强，我们走了以后，有一次大的清洗，把我姐姐、吴畏、黄秀都关起来。我姐姐被关了8个月，还是晋察冀总部派许建国来找她们谈话，最后把她们放出来了。放出来以后，许建国让她们继续参加剧团。

当时很多在职干部也要到抗大去学习。我们的队伍一共有100多人，六分区的司令员沙庆兰（后来叫沙克，国务院二办主任）是我们队长兼班长。他跟我很好，还送我一把手枪呢。他比我大，那时我年龄小，不到20岁，他一天到晚叫我小陈，有时顺口还叫我小鬼。我们组成一个行军的队伍，整个大队有大队长、政治委员。我记得大概是9月19日开始动身，步行从当时的晋中区的总部任丘青塔镇出发。供给部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大衣，还给了几块钱、两双鞋。我自己从北京带了两件衬衣，就开始行军了。

开始一两天我们每天走四五十里，后来每天走60里，一个礼拜以后，每天走

<sup>①</sup> 廉静：《名家口述中国文艺》，北京：文化艺术出版社，2007年版，第19—53页。编者按：本书有删节。

80里。



陈紫晚年在创作

我记得路上有卖水煎包的，出发时我们每人带了5块钱，到了延安基本上没钱了。我记得在河北时，一毛钱买20个鸡蛋，一顿饺子也不过花一毛多钱，那是1938年。我们都是天刚刚亮起来，有人打尖，有人吃饭喝水。开始走的都是游击区，没什么干扰，走得很顺利。走到离望都县有30里路的时候，准备过铁路了。

那天4点多钟就在一个村子停了，准备过铁路。大概走了60里地，大家到了后就睡觉，睡到第二天下午4点，开始行军。由当地的八路军村政权派人做向导。那时边缘地区的村政权基本上都是两面政权，明着支持日本，暗地里给八路军干事。三十里路按说也就走三个钟头，平时我们一个钟头走九里路、十里路。可是那次从4点钟开始走，12点钟才开始过铁路。不是直接走，是绕着走，大概走了六七个钟头才过铁路。天黑后进入敌占区，所以要绕路走。我们这些学生从来都没经历过这种事情，所以心情都有点紧张，可并没有惧怕，也许是人多的关系吧。但队伍中并没有几个有枪的，几个领导、保卫干事带着手枪，再有几个战士有几杆大枪，仅此而已。

过铁路时大家一句话都不许说，每个人用一条白手巾系在脖子上，大家一个挨一个走。晚上有星光时还能看见一点路，没星光一点路也看不见，特别黑，系个白手巾能看见前头的人跟着他走。到了铁路边，火车站有一个大的探照灯，我估计就离车站二三百米，最多四百米，谁都不敢吭声。刚刚要过铁路，这时一列火车开过来了，大家全都趴下了。火车上面灯哗哗地照，这时真是紧张至极。火车过去，我们才过铁路。当时是小知识分子，觉得这种情景很值得纪念。我们几个学生每人都从铁轨边捡了一块石子揣起来了。

过了铁路，再没遇到什么挫折，可是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，怎么走也走不完，一直走到1点多钟才到了村子。我们刚刚做好饭准备吃饭，就说有情况，每人拿手巾把饭包上，拿了几块咸菜别在腰里，立刻出发。

路上经过好几个村子都没有人，天亮前开始爬山，一直走到第二天天亮才到



了一个山上。我记得那个山很特别，好像是半圆形的，村子也是半圆形的，下面是一个很深的坑。过一个村子时，我们把一个村长抓起来，弄了两袋粮食，让他找了两个人一直把粮食给我们送到山上，然后才把村长放回去。

我们在那里打尖，天亮后吃饭，睡了不到一个钟头，就说敌人已经发现我们越过铁路，派兵追来了。于是我们继续走，一直走到中午12点才停下来。走了多少路我不知道，足足走了20个钟头，中间休息了一个多小时。

原来是那个村长回到村里就报告了日本人。他不能不报告，我们当时有意将他扣在山上，尽管他可能是我们的人，也要防他一手。那时候好人坏人分不清，谁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？放走他后立刻有情报说，日本人来了，所以我们只休息了一个多钟头就又走了。那两袋粮食我们吃了好久。

后来我们走过好几个佛庙，有的佛像好几丈高，都没脑袋了。我们还走过一片黑枣林。我们离开望都就到了黑山涧，路过了蠡县、高阳、肃宁、安国、安平几个县。

望都在保定南边，在石家庄和保定中间。过了望都我们首先到了灵山，从灵山到阜平，从阜平到龙泉关石嘴进入五台山。

我从没到过山里，以前只到西山玩玩，以为过了山就是平原了。进山以后我才发现我的想象完全不对，一座山过了又是一座山，越走越走不完，总是看着那山更比这山高。有时我们还要过小溪，北方10月份已经秋凉了，10月初觉得挺凉爽，到后来就越来越觉得寒冷刺骨。溪水清极了，可溪水下的小石子扎脚。

慢慢的脚上开始打泡了，打泡就要硬治。我们班长姓任，弄个土豆搁在火里烧，烧得热热的，把泡挑破了，使劲把热土豆往上一贴，烫得我要命，可真管用。走路多了以后脚起茧了，就不是很疼了。供给部发的两双鞋走了半个多月，基本上都走破了，只好过村子时去征鞋。有的鞋好还能走一阵，有的鞋做得不好，路上净是石头子，鞋底一下子就穿了，疼得我要命。那时候也有偷工减料的事情。

过龙泉关我的印象最深了。山路走个没完，路都是石板铺的，连房子也是石板的，墙是用石头垒起来的。我记得路过一个村子，旁边是万丈悬崖，还有松树伸出来，有鹰在那儿盘旋，下面是石头屋子，柿子树全都红了，阳光一照，我好像觉得真是到了画里一样。整个山像一个大圆柱子，村庄就像在一个石头台子上。太行山真是雄浑奇伟。



我们从阜平爬到龙泉关的时候，越上越高，两边道路狭窄得很。那时候，我已经被锻炼出来了，走得不像开始时那么费劲了。我们那天从早上7点钟开始行军，一直走到12点多了才爬到山顶。到了山顶，大家一下觉得天空豁然开阔了。前边的人“哎呀、哎呀”地叫了起来（后来我们把那个人就叫作“哎呀”了）。因为山很高，站在山顶能望出百里。在云雾遮笼下，山峦都在脚下起伏着，那个情景真是无法形容。太行山是从平地一下子起来的，其实它的高度也就两千多公尺，可是对比度很大，所以显得很高。当时的那种情景，让人终生难忘。后来我读到毛主席“五岭逶迤腾细浪”的诗句，我觉得山峰在脚下的确就像是细浪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就住在龙泉关。龙泉关是一个小镇。我们号房子号到了棺材店里，也没有床铺，只好把褥子铺在棺材板上，穿着大衣一倒就睡了。当时也不害怕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看《徐霞客游记》时，发现他有一段路走的路线基本上和我们走的路线是一样的，他也到了龙泉关。龙泉关真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要冲过去是很困难的。

从龙泉关下去就是石嘴，我们在石嘴作休整。石嘴有几座大庙，建筑得特别好，都是水磨方砖，磨得很平，缝也很细，佛像很新，连续几个庙都在山里头。我们住在山沟里的一个骡马大店里，准备休整一两天后过同蒲路。

那天还没到吃饭时间，突然山上的钟“当当”地敲响了。大家一听是警报，日本飞机来了，赶快从旅店里跑出来趴在地上。日本飞机在村子里投了十几颗炸弹后飞走了。我们再集合队伍时，发现有一个人受伤了，但不是炸弹炸的。他跑出来时，晕头了，慌里慌张跑错方向，脑袋撞墙上了。

我们遭遇日本飞机的轰炸不仅仅是这一次。还有一次，我们走在路上，路旁有一排柳树，正当我们赞叹山野景色的美好时，日本飞机来了。飞机飞得很低，我连飞行员的脑袋都看见了。我们100多人的队伍拉得相当长，因为后边还带着辎重。日本飞机扔了两颗炸弹，在队伍前边扔一颗，后边扔了一颗。后边那颗炸死了一头驴和一个驴夫，还把文件箱子都炸飞了。飞机还用机关枪扫射，有两三个战士受伤。我们在中间的人没什么损伤。两次轰炸我印象都很深刻。人很奇怪，到这时候也许是因为有队伍的关系，觉得没有什么害怕的，好像没有感觉到危险。

在石嘴休息了一两天后我们又到了豆村，准备过同蒲线。可是当天晚上接到情报说，敌人准备围剿，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过铁路。我们已经出了豆村，又

连夜返回往南走，准备过正太线，沿着河北、山西边境走。那里都是很高的山，豆村离五台山已经很近了。

我们到了五台山上的一个庙。抗战以前那个庙里有2000个和尚，抽烟都是拿烟叶子烧用管子吸的，抗战以后和尚少了。五台山不止一个庙，我们到的是个很大的庙。我们顺着山脊梁走井陉，过回拔岭。

只有几个干部有几匹马，马根本上不去，他们只能另外绕路。天又黑，根本看不见路，有人带路，但仍有点慌不择路的感觉。那条路也就不到一米宽，人得贴着墙走，下面就是万丈悬崖。后来大家把白手巾系在腰上，我们一个人拉着一个人走。不时有云彩从脸上飘过，好像是水蒸气，云彩过后，身上都是潮乎乎的。有三五个人滚下去了，我们也没办法救他们。大家就给他们扔了几块洋钱、几块干馒头。他们如果能活，只好让他们自己去想办法了。

走到井陉，上面有一个村，在那儿歇歇脚。那村子太高了，根本没有井，挖坑蓄的雪水，喝陈年积水。我一看，炕上妇女都很白很胖，后来才知道那里根本没有盐吃，也没有粮食，只能吃南瓜。人长得很胖但都是虚的，头发、眼珠子都是黄的，皮肤特别白。他们祖祖辈辈都那样。

中间我们还碰到一次险情。大家走着、走着，黑夜，突然间有人睡着了，太困了，站着就睡着了，后头跟着一个个都睡着了，结果脱手了。突然有人一激灵醒了，说怎么不走了？才发现已经和队伍失去联系，而且就我们二三十人。那时心情非常焦急，跟集体一脱离，就感到很危险。于是派人去头尾找，大队也发现少了人，又派人回来找，足足找了半个多钟头，终于找到了，这时候才觉得一块石头落地了。因为连夜行军，还是一天一夜。那个人睡觉也就10分钟，便失去联络了。

从井陉一直南下，通过和顺，从和顺到了燎县，就是现在的左权，离大寨不远了。到燎县一看，和河北的风俗有明显的不同。山西人特别喜欢裹小脚，脚裹得特别小。女孩子穿大红裤子，感觉说不出来。确实有山里的特点，大红大绿，和河北的青衣布衫大不一样，是一种乡土气息浓厚的艳丽。

过正太线时两双鞋都打窟窿了，本来还想捡几块石子，但最终没捡，而且连以前捡的也扔掉了。过正太线比过平汉铁路时好得多，因为没碰到火车过来。我看那些当过排长、连长的人拿着枪，催我们“走！走！走！”真有点军人气质，令

人钦佩。过正太线时，我们以急行军的速度，一小时走了15里。

从燎县下来到长治，已经是丘陵地带了。那时正是秋天，粮食打回来了，小米等都收了，草堆子摞起来很高。有时号房子很挤，还有臭虫。我和冯牧两人干脆就趴在草垛子里，脚和身子伸在草垛子里，把脑袋露在外边。赶上半夜突然下雨，就赶快把脑袋缩在草垛里。但雨顺着草垛往下流，实在待不住了，就又赶紧跑回屋去了。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还真是有一些特别的情调。

冯牧身体不如我。我好运动，中学时还因为踢足球蹲了一班。我们这样一路走了几个月，可以说是成了患难之交。大家互相照顾，这种照顾是很细微的，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，而且是不需要通过言语来表示的。

比如说，他脚打泡了，给他打盆水，泡泡脚；走路走不了掉队了，等着他一块走；号房子住在一起，什么话都谈，诸如此类。人们说我们知识分子有小圈子，我们也没办法。班长对我特严格，但对我特好。好多生活上我做不了的事，他都帮着做。稻草有时是湿的，我们烧火烧不着，眼睛被熏得睁不开流泪，他们笑话我们这些学生连烧个火都不会。我们班长真能干，又煮饭又炒菜，当然都是萝卜、土豆之类的。进了山西以后，环境还比较好，那时日本第五次“围剿”还没来，左权还没牺牲。

有一次天还没亮，听说敌人出动了，要我们赶快上山。当时暖暖和和地睡在热乎乎的炕上，真不愿意起来。可没法子，还是得起。我们早饭也没吃，揣一块干馒头就上山了。走了一两个钟头，到了半山腰，太阳出来了。

那天一点风都没有，天蓝极了，从山腰回头一看，村里家家户户的炊烟直直地冒起来，像柱子一样上了蓝天，好像都能够闻到烧火的稻草的烟灰味儿。猜想老乡们正在就着咸菜，喝热腾腾的苞米楂子粥呢，心里就不由得想到，这时候要有一碗苞米楂子粥多好啊！其实，我留恋的并不是一碗粥，我留恋的实际上是那种和平的感觉。烟直直地升上晴空，一点云彩都没有，让人觉得村子里无限的和平、安详和温暖！

除了经历过这种令人羡慕的安详景象外，我们还经历过截然相反的境况。

有时我们走在山里，遇到瓢泼大雨，但是绝不能停下避雨。我们在大雨中艰难前行，两边都是山，除了雨声、部队走路时鞋发出的“刷刷”声外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。四周沉寂得令人恐怖，我们好像走在死亡之谷里似的。这时，多么希

望有两声狗叫啊！一听见狗叫、人声就立时觉得亲切得不得了。这些都是行军途中的感受。

从襄垣下来到长治，从燎县再到屯留，就到了晋察冀八路军的总部了。我们的队伍在那里留下来了，让我们先不要去延安，说这里有抗大分校。

我记得屯留抗大分校的校长是孙胡子——孙毅，他给我们讲游击战。讲哲学的教官姓洪，他给我们讲马列主义、辩证法。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都是非党员，有些人经常不来，走了。后来才知道他们被扣下了。当时的政治形势很紧张，我们当时不知道实际上那里正在搞肃反。我们的路队长、政委、保卫干事等四五个人都被打成是托派，被扣了下来。名义上留在分校，实际上在进行干部清洗。

在抗大分校停留了十几天后，我们被允许可以继续向延安进发了。出发时一看，我们来的时候的队长、一个副队长、一个保卫委员、郑参谋长（新中国成立后是河北政治学院院长）都没在队伍里，一部分人被扣下了。这些人有的后来就在晋察冀分配了，不再到延安去。

我们的路线从长治到高平，高平到晋城，晋城到阳城，然后直奔黄河边上的王屋山。过了阳城一接近王屋山，只见满眼的地瘠民贫。王屋山上没有什么田地，也没有大树，山上是光秃秃的，只有一些矮树。那个地方，已经属于国共两管区，国民党、共产党都可在那儿走来走去。在那里我们碰见一批从黄河过来的四川兵，他们说四川土语，个别人休息时和我们谈谈。他们条件也很差，特别是军官为了自己有钱抽大烟，逼每个当兵的都要买一包白药。

从垣曲过黄河不是很险。我们过了黄河就奔古时候蔺相如和秦王会晤的地方渑池。到渑池我们上了火车，因为我们都穿着灰军装，所以坐火车不用买票。我正好和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坐在一块儿，他二三十岁，戴着金边眼镜，显得很有文化，像个白面书生。他带着佩剑，显然是从军校毕业的。

潼关在黄河南边，到潼关以前，火车不能走了。火车在离潼关二三十里的地方停下来，我们就在村子里住了下来。

潼关很雄伟，山从平地上像一堵墙似的一下子就起来了。过潼关也就七八里地，我们从山上国民党炮兵阵地过去。这时，来了七架日本飞机，头一架飞机一歪翅膀扔下炸弹飞走了，然后第二架飞机又下来了，七架飞机这样来回地轰炸阵地。轮番轰炸不止三四次，扔了有几十个炸弹，足足有半个多钟头。日本人还往

阵地上打炮。我们有一个参谋长想撒尿，正碰上日本人打炮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把尿憋回去了。这边国民党阵地的机关枪、高射炮也都开火还击。我们都趴在地上，飞机走了，我们才继续前进。过了防线，大家的心情才松弛下来。

过了潼关，再往前就是风陵渡。我们到那儿时已经是黄昏了，太阳从风陵渡落下去，那风景活脱脱就是一个“长河落日圆”！风陵渡宽极了，日本人隔一两分钟就打一下炮。我们有几匹马驮着文件，没从山上走，走潼关前过桥，刚过了桥，“砰”的一声一个炮弹把桥炸断了，但我们的骡子、驴都没被打着。我们也从山上下来了。

过了潼关没多久，我们又上了火车。火车路过华山，华山真险，像个柱子似的竖起来，上面还有云彩环绕。

当天晚上我们到了西安，马上派人去找八路军办事处，请示我们这批人在西安是否停留。到了西安，我记得车站的乌鸦多极了，满天都是。

我们在车站停留了一个多钟头，最后跟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上了。八路军办事处指示我们连夜离开西安。

我们夜行军到了咸阳。出了西安没多久，一片黄土地，好像寸草不生，满目荒凉，有一种到了边塞的感觉。离开咸阳后基本上走的都不是官道，一直沿着泾河，奔泾阳的抗大分校。从西安到泾阳抗大分校路上走了六七天。我们就这样到了泾阳抗大分校。

到了泾阳分校一看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头一课就是挖窑洞，给我们发了锄头、土筐、铲子、几根杨木。有人指导，我们一面挖一面架梁，用胶性大的泥刷墙，像一层石灰腻子似的。12个人挖一个窑洞，挖了六七天，挖好了再抹上泥，就那么潮潮湿湿的，挖炕洞，捡柴火往里烧。炕不是搭的，是从下边掏洞。烟筒是半个圆筒，烟顺着往外跑，烟筒上摆几块砖搭一个小房子。

挖好窑洞我们就开课了，当时泾阳抗大分校校长是何长工。上了不到两个礼拜的课，何长工奉命从泾阳抗大分校调到晋东南抗大七分校。经带队的领导决定，我们这将近一百人，五十几个人继续到延安，留了一少半到晋东南。

从离开西安出发去咸阳后，就觉得到了边塞。从泾阳到延安途中就更荒凉了，好像到了天涯海角似的。路过黑水关，那真是荒凉至极——茅草长得比一个人还高，走到跟前，“噗”的飞出一只野鸡，好像从没人走过似的，实际上那是人走过

的路。

走了七八天后，终于到了延安。我们抵达的那天是1939年1月1日，正好是新年。到达延安时，队伍从刚开始出发时的一百多人减到五十几个人，这中间知识分子不多，有我和冯牧两人，还有几个女生。

我们是从9月19日出发，历时三个多月到达延安的。除了中间坐过小段火车外，我们大部分的路程是徒步完成的。

在赴延安的路上经历了不少艰苦，有时也真有点坚持不下去了。到达大城市西安时，看到那里的城市夜景，真是有点留恋。一走出西安，特别是过了咸阳，看着四周的荒凉，产生一种被充军的感觉。我一个学生过去从来没有离开过家，刚开始上路时，也会不由得想家，有时也会产生一种孤寂、漠然的感觉。

### 进延安抗大

到延安以后，我觉得透了一口气。

人的思想并不是单一的，人总是同时存在各种不同的思想。人生有很多东西，有很多思想不是直线的。我觉得写人物要写得真实的话，就必须写他的各种思想。

比如说，“九一八”时，正值民族危亡，我是热心救国的青年，当时在北京，我参加救亡运动，非常活跃。尽管我参加这些严肃的政治活动，但我毕竟还是个充满活力、有血有肉青年人。所以，我同时也没有忘记玩耍，也去溜冰，也跟女孩子交朋友；也唱意大利歌、美国歌，看美国电影；还读艾思奇的《哲学讲话》。大概知识分子就是这样，革命和享受同时并行。

也许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弱点，他不像工农兵想得那么单纯、那么简单。或者说我们作家并不真正了解工农兵的想法，把许多人物包括工农兵写得简单化了，好像人物就那么一种想法。这一点就不如鲁迅，他写阿Q，一会儿写他要革命，一会儿写他见了吴妈又和吴妈调情，见了赵太爷也不买账。这个人物写得很活、很实，让人觉得是这么个人物。阿Q你说他是市民也可以，说他是农民也可以，带点市民味道。

在北京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散文，得了一块钱稿费，因此特别想搞文学。那时特别着迷何其芳的散文，外国小说也看了不少，脑子里的共产主义不多，倒有很多虚无主义的东西。



我看了巴金翻译的《虚无主义运动史话》《门槛》，克鲁泡特金的《面包掠夺》等书。当时我受这些影响，想当十二月党人，想着怎么去杀沙皇。有种狂热的革命热情，想马上拿个炸弹去献身啊。当然也看了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，第一版叫《西北印象记》。那是禁书。我在中学时看过，里面有延安的照片，到后来看的《生活》杂志都是禁书。我记得是同学传给我的，看的时候，封面上写的是《红楼梦》。当时这些事都是我们当“民先”（“民先队”全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）时干的。

到延安抗大，学习的时间很短，只有不到一个月就算毕业了。因为在到延安之前，还在泾阳的抗大和晋察冀的抗大学习过，所以，实际上在延安抗大等于是补课。在延安抗大的学习主要内容包括了步兵操典、游击战、统一战线政策，等等。

我们在抗大只留下五十几人，我们班长是沙克。五十几个人中基本上都是干部，只掺杂我们几个学生。每天由罗瑞卿训话，具体讲了什么，我现在记不得了。只记得毛主席也到抗大讲过话，他说：“现在抗大成立了，抗日战争好打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培养出干部，有干部就有队伍，有了队伍就好打了。”在抗大期间还参加了修建飞机场的工作，那是1939年年初的事情。

在师范大学时，我到图书馆去借马克思的《哲学的贫困》，可是看不懂。那时候到延安去，谈不上真正对共产主义有多少认识，虽然看了《共产党宣言》，也不是很懂。那时对革命多少带有一种幻想，或者带有狂热的性质。只有在延安抗大上课后，真正看了马克思、斯大林的东西，学了联共党史、政治经济学，自己还看了恩格斯的《家族的起源》等，上了一些大课，加上学习毛主席的《矛盾论》《实践论》后，才有一些共产主义的观念。

抗大的生活非常俭朴，每月发一块钱的生活补助费。礼拜天放假，抗大学生到机关合作社花三毛钱买一碗红烧肉。一个大个子一块钱可以吃三碗红烧肉，再来一盒金谷牌香烟。到了鲁艺以后，生活补助费增加到每月一块五。

在抗大没多久就毕业了，准备毕业时，我不愿意干打仗的事。教官觉得我是知识分子，想推荐我到参谋训练班。可这会儿我已经知道有鲁迅艺术学院。

一个礼拜天，我到延安城里，在街上碰到鲁艺一个学生。我记得他的名字叫鲁克，显然这不是他的原名。

一般人到延安都改名了，我一到了游击区就改名了。最早家里给我起名叫陈先逸，我哥哥叫陈先瑞，我姐姐叫陈先达。而且父亲给儿子们还起了字，我哥哥字子玄，我的字叫子述，后来把“述”改作树木的“树”，这名字我上学时也用过。我到了延安解放区以后干脆“树”字不要了就叫陈紫了，把原来字里的“子”改成“紫”了。“子树”改成叫“陈紫”。当时还开玩笑说，正好统一战线了，国民党是蓝的，共产党是红的。在蓝红两色之间，就是我这个紫色了。可以想象出我那时候还相当幼稚，这就是“陈紫”这个名字的来源。

那时候我们军装衣袖上都挂着牌子。游克的牌子上写着“鲁迅艺术学院”，蓝字白地，还有“八路”两字。当时八路还分两种：一种字大的八路是老八路，一种字小点的是新八路。

碰见游克，我一看他衣袖上“鲁迅艺术学院”的牌子，就问他：“你是鲁艺的？”

他说：“我才考进去。”

我问：“还招吗？”

他说：“还招呢。”

我问他：“什么系？”

他说：“音乐系。”

我问他：“都考什么？”

他说：“考点乐理，让你默写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谱子，然后唱两个歌或者发声。”

我问：“文学系呢？”

他说：“文学系要考的，最好要有作品拿出来才行。”

我问：“报名的情况怎么样？”

他说文学系那儿报名人数很多，他们那一次四十几个人才取了两名，可音乐系一共九个人报名取了七个人。我一想文学系四十几个人才能取两个人，这希望太小，音乐系呢？上一次是九人取了七人，这次去考的人也不会多。

我就又问：“上了鲁艺是不是还有转系的？”

他说：“有。”

我想，不考文学系，考音乐系。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，跟声乐老师专门学过